

“优选骑手”配送中受伤后面临困惑—— “要打卡、有考核，受伤为何不能算工伤？”

法官认为，应赋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选择职业伤害保障救济或工伤保险救济的权利

本报记者 黄洪涛
本报通讯员 孙丹丹 艾家静

都是“赶时间的人”，可外卖骑手的身份有所不同。有的为“众包骑手”，可自主接单，在某一时段自由配送；有的为“优选骑手”，必须接受平台派送指令，收入由平台工资和订单配送费构成。虽然骑手类型不同，但可能都面临“身份认定”的困惑。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优选骑手”与某外卖平台合作商的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作出二审判决，认定骑手与平台企业存在事实用工关系。

“优选骑手”受伤后引发身份困惑

2021年6月，有一份日常工作的小阳(化名)出于多赚一份钱的考虑，注册成为某外卖平台“众包骑手”，闲暇时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每天随自己的时间决定跑几单，大概能赚几十元钱，“很自由，想接单就接单，不想干就不干”。

2022年7月，小阳辞去正式工作，加入平台合作商的“优选计划”，成为一名“优选骑手”。他的日收入涨到300余元，但同时，手机里多了几个打卡群，每天被各种数据指标迫着跑：高峰期至少完成5单、请假至少提前1周报备、各项考核指标必须达标……

没想到的是，成为“优选骑手”不到1个月，小阳在送餐途中遭遇车祸导致骨折，构成九级伤残。平台合作商为其申请了职业伤害认定。领到5万余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后，小阳认为自己应该认定工伤，“要打卡、有考核，这不就是正儿八经地上班吗，受伤为何不能算工伤？”他一打听得知，如果认定工伤，自

私家车改网约车出事故引赔偿纠纷

平台和司机被判承担连带责任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钟州琼 张月梅）网约车在接单运营中发生交通事故，损失应由谁承担？近日，广东省南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涉网约车运营时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024年7月，黄某甲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黄某乙，在行驶中与被告何某驾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死亡、双方车辆受损。经认定，黄某甲负事故主要责任，何某负次要责任。黄某甲亲属将何某及某出行公司、购买商业险的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诉请法院判令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交通事故各项损失共计4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何某注册成为某网约车平台的司机，但何某在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其小型轿车系用于从事运营的事实。因此，被告某保险公司抗辩其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的免责事由，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登记在何某名下的案涉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某出行公司接受何某在其提供的服务平台上登记注册并接单营运，存在一定过错。某出行公司从何某的营运活动中收取服务费，本案事故发生时，何某也是在某出行公司所提供网约车平台接受派单并运载乘客，故被告某出行公司与被告何某应承担本次事故的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何某、某出行公司连带赔偿40余万元给原告方。二审维持原判。

阅 读 提 示

外卖平台“优选骑手”在配送中遭遇车祸受伤，平台合作商为其申请了职业伤害认定，但骑手认为，自己接受平台管理，对是否接单、接单内容并无实质自主决定权，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认定工伤。

己至少能拿到10余万元的赔偿。

小阳于是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仲裁未予支持。他又诉至法院，获得一审判决支持。平台合作商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院认定平台企业存在用工事实

二审期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先对不同骑手之间的区别予以查明，“众包骑手”和“优选骑手”在注册方式、派单方式、管理方式以及薪资构成及结算上都存在明显差异。

“比如，平台向‘众包骑手’派单，骑手可选择接单或不接单，一经确认接单，即应如约完整履行，薪酬结算也根据配送完成情况计算；‘优选骑手’必须先加入‘优选计划’，短期不能随意退出，对平台派单骑手不可无故拒绝，相关管理考核也非常严格，一旦未能完成计划要求，就会恢复为‘众包骑手’。”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法庭庭长沈军芳说。

法官审理认为，劳动者主张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

法作出相应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就本案而言，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小阳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沈军芳说，“结合小阳与‘优选骑手’队长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析，加入‘优选计划’后，小阳接受队长的日常工作管理，包括排班调休，以及队长根据‘优选计划’介绍及申请要求，对小阳在线时长、高峰期在线时长、配送订单数量、准时率、完成率等均有明确要求，队长的上述行为属于代表案涉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其管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

沈军芳表示，上述管理事实足以体现小阳在提供劳动过程中，对于是否接单、何时接单、接单内容并无实质自主决定权，日常工作接受公司的管理指挥与支配约束，双方之间具有明显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且上述公司对小阳的管理具有明显支配性特征。

综上，法院认定，案涉平台合作公司对小阳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且小阳就所提供劳动对用人单位具有明显的经济依赖属性，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于是判决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小阳也于本案生效后表示，其在劳动关系确认后，将向人社部门申请撤销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认定，重新按照工伤申报流程进行工伤认定以及工伤等级鉴定。



上门立案

10月13日，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吕村法庭法官王西卉、赵新等人前往辖区李老大家中，对一起健康权纠纷案进行上门立案。李老太今年89岁，行动不便，法官为切实方便其参与诉讼，专程上门为其办理了立案和委托手续。

该院针对老、弱、病、残等群体人员维权案件，主动前移服务“窗口”，视案件情况推出了上门立案、上门调解等便民利民举措，实现诉讼服务“零距离”。 本报通讯员 黄宪伟 摄

责任编辑：卢越
E-mail:grbby@163.com

最高法新规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

网络隐私权纠纷纳入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

本报讯（记者卢越）日前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作出调整完善，新增四类网络案件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

2018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8年规定》），明确了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十一类案件。在《2018年规定》基础上，《规定》将“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规定》施行后，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市辖区内应由基层法院审理的上述案件将分别由三家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有效探索前述新型、前沿、重点网络领域裁判规则，发挥规范引领、促进保障作用，及时回应网络空间治理新要求，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规定》删除了《2018年规定》中由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以及网络侵害名誉权、一般人格权、财产权等传统网络侵权纠纷。

《规定》延续《2018年规定》，明确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法院审理的四类案件，继续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相应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涉外涉港澳台案件范围。此外，《规定》还对互联网法院的指定管辖、协议管辖、案件上诉机制等问题做出规定，相关内容与《2018年规定》总体保持一致，确保互联网法院管辖调整有序衔接、稳妥推进。

司法部发布典型案例整治“乱检查”“乱罚款”

诠释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作用

本报讯 司法部日前发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集中呈现治理“乱检查”“乱罚款”中的实践成果，诠释了行政执法监督在纠治执法乱象、树立“执法为民”理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针对涉企检查中“主体不适格”问题，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加强监督，完善制度机制，坚决杜绝无资格、越权检查等行为。典型案例中，贵州某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针对县交警大队辅警独立执法的问题，从个案问责延伸至程序规范，厘清辅助人员权责。

典型案例体现治访过度检查，保障企业安心经营。针对涉企检查“频次过高、重复扰企”问题，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强化监督联动、创新工作模式，推动行政检查从“分散随意”优化为“统筹高效”。湖北某市生态环境局勇于自我纠错，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以个案整改切入，发挥党委、政府统筹引领作用，推动全市形成“自查自纠+全域规范”的规范涉企检查工作模式。

针对“违规设定罚没指标、程序违法”问题，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坚持“纠错问责+制度补漏”双管齐下，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江西某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对县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的违法违规问题，在责令纠正、暂扣涉事人员证件并移送纪委监委追责的同时，推动全县健全执法责任与过错追究制度，从个案纠错带动制度完善，杜绝“程序空转”。

典型案例规范事实认定，确保处罚精准合理。针对“事实不清、重复处罚”问题，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秉持过罚相当的执法原则以及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要求，推动行政处罚事实认定从“模糊随意”向“清晰合理”转变。案例中，山东某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纠正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处罚不当问题，指导其根据具体事实依法适用不予处罚规定，实现从个案纠偏到执法理念优化的深度转变。吉林某县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在指导县林业局纠正重复罚款问题的同时，推动执法部门建立执法信息共享机制，打破部门壁垒，避免企业因部门协作漏洞而承担额外负担。

（法文）

配送员猝死保险金被以“既往症”为由拒赔

法院严审免责条款效力判决保险公司赔偿80万元

本报讯（记者鹿慧敏）随着依托平台就业的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加，与之相关的新类型法律问题也逐渐增多。近日，一起配送员在工作中猝死、保险公司以“既往症”为由拒赔的案例，牵出了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

2022年6月1日，黄某入职广西天等某公司从事货物配送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年10月13日，该公司作为投保人，为黄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次日，黄某在配送途中被路人发现神志不清摔倒在地，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司法鉴定意见显示，黄某系因高血压性心脏病并发小脑及脑干出血导致猝死。

天等某公司随后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以黄某死亡不属于意外事故，系既往症（高血压、脑溢血）引发猝死为由，拒绝赔偿。黄某家属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8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合同上的格式条款没有向投保人尽到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合同特别约定中的“既往症”的定义缺乏具体明确的认定标准；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黄某在投保前曾患过或知道自己患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的“既往症”。据此，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支付黄某家属保险赔偿金80万元。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作为专业机构及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当对“既往症”等免责事由作出清晰、准确的界定，并向投保人进行充分提示和说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时，严格审查“既往症”免责条款的效力，有助于防止保险公司通过模糊表述规避保险责任，维护保险合同的诚信基础，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周倩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诸多领域实现广泛应用，其中在自动驾驶方面的应用成果尤为瞩目。然而，技术的快速迭代也催生出新的法律问题，人工智能在拓展人类能力的同时，能否减轻甚至转移人的法律责任？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了解到一起涉及醉驾时开启自动驾驶功能的危险驾驶案。经审理，法院明确指出，当前阶段的自动驾驶技术仍属于辅助驾驶范畴，车辆行驶安全的最终责任人仍是司机。

2023年3月某日夜间，闫某某与几位朋友聚餐饮酒后，一位朋友叫了代驾。代驾司机驾驶闫某某的汽车将其朋友送到家后就离开了。闫某某认为自己新买的电动汽车具有自动驾驶的功能，可以自动躲避障

碍和保持车距，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回家。

途中，闫某某驾驶的汽车遇民警拦截检查。民警对闫某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170毫克/100毫升。民警将其带至医院抽血化验。经检验，闫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200毫克/100毫升。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刑事立案，并以闫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对其刑事拘留。后案件被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闫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建议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闫某某自愿认罪认罚。

闫某某的辩护律师认为，整个醉驾过程中，闫某某的电动汽车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现今自动驾驶技术相对成熟，能按照预定路线到达目的地，还能躲避障碍、及时刹车，因此闫某某此次犯罪对公共安全的危害

相对较小，请求对其从轻判处。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闫某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对于辩护人所述被告人闫某某开启自动驾驶功能后可以减轻对公共安全危害的意见，法院认为，经查，现阶段自动驾驶在我国处于试点、示范应用阶段，各地对申请自动驾驶主体、车辆型号、自动驾驶级别及试点、示范区域均有不同的限制性规定，闫某某被查获时明显不符合上述条件要求；现有证据未显示其车辆具有自动驾驶功能且被查获时已开启该功能，即便其已实际开启，被告人闫某某供述亦显示该车辆对驾驶员的依赖性较高，法院对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最终，法官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

判决。

闫某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启用驾驶辅助功能属驾驶行为，驾驶人仍应承担责任。”该案审理法官姬广胜表示，根据2022年3月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等相关规定，启动辅助驾驶功能后，驾驶主体并未变更，车辆驾驶仍然高度依赖驾驶人。该案中，闫某某作为第一责任人，闫醒醉酒导致的控制能力及操作能力下降的危险，仍然驾驶机动车，在醉酒状态下驾车导致的危险状态并未减弱。因此，启动自动驾驶不能成为对闫某某从轻处罚的理由。

该案判决不仅厘清了现阶段自动驾驶场景下的刑事责任认定，也向社会传递了明确的价值导向，技术进步不应成为规避责任的借口。